

戴志钧 著

读骚十端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读骚十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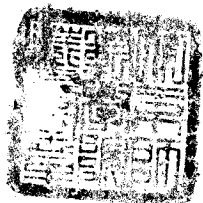
戴志钧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5265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075265

责任编辑：任国绪

封面设计：王祖珍

封面题签：李延沛

读 骚 十 论

Du sao SHI lun

戴志钧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5 12/16 插页 2 字数 140,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46

统一书号：10093·680

定价：1.30 元

戴志钧 著
读 骚 十 论
PDG

戴志钧著《读骚十论》序

张志岳

戴志钧同志和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共事多年，平日过从论学，不少假借，每有争议，必求犁然有当于心而后已，而这也就能促进彼此间的相互了解。最近他把近年来所作关于屈原的论文十篇，辑为《读骚十论》一书，要我写一篇序文。我对屈原的研究所知甚少，谈不上一个知音的读者；但这些论文，每一篇完稿，我都先拜读过，对于作者惨淡经营的过程，或能多有一些感受。因此，我不辞衰朽不文，愿意就这方面来说几句话。

志钧同志治《楚辞》与屈原之学，我以为有以下的三种困难：

第一，先秦两汉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资料很少，而且又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今古考论，莫衷一是。

第二，建国以来，《楚辞》和屈原的研究在学术领域内一直是热门，凡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差不多都已经有人论证过，要前进一步很不容易。

第三，由于研究《楚辞》及屈原必须具有相应广博的历史知识、古文字知识乃至有关的古籍校勘等知识，而这类书籍和资料又往往不是一般图书馆所能具备的；同时也需要在学术界有些志同道合的师友相互研讨，相互促进。就志钧同志所处的此时此地的条件来说，都是不能不受到较大的限制的。

志钧同志面对这些困难，不是止步不前，而是知难而进。综

合稽考，去伪存真，批郢导窾，力探奥秘。其有同于旧说者，既能多方补充阐发，加强论证；其不得无异于旧说者，更着力就其所以另立新说的理由，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每撰写一篇论文，都能在全面进行史实考核和作品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印证，触类旁通。稍有疑滞，冥思苦索，往往数易其稿。我们知道：只有不畏困难的人，才能攀登科学的顶峰，我读完全书，深感志钧同志这种精神的难能可贵，读者也一定会有同感的！

志钧同志是中年教师，任务多，家累重，而又患比较严重的骨质增生慢性病，经常要和生活与疾病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仍能不断地坚持钻研，完成屈原研究的重大课题，为学术界作出新的贡献。这种坚强的事业心实在值得钦佩，值得关怀！

志钧同志通过这次屈原课题的系统研究，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同时，也在钻研课题的范围内，严格锻炼了自己从事科研的多方面的能力。可以预计：以此书之成为发轫，进而研治其它的新课题，一定能不断地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假我数年，能够看到志钧同志的日进不已，我将更乐意为志钧同志的新著作序的！

1983.2.8

目 录

论屈原的“美政”理想	1
《惜往日》在屈赋中的地位	25
关于屈原爱国思想的几个问题	42
屈赋探要	62
《离骚》作于楚怀王晚年说	80
“彭咸”在屈赋中的意义	102
《离骚》的组织结构与构思艺术	117
骚艺二札	130
《离骚》艺术辩证法三题	141
关于屈赋中伍子胥的问题	163
后记	180

论屈原的“美政”理想

屈原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为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文学家的创作开辟了道路。同时，他也是登上世界文学史高峰的人物之一，成为世界性的伟大诗人^①。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屈原，是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屈原研究中，我们首先遇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他的“美政”理想具有怎样的内容和具有怎样的意义。屈原在他的代表作品《离骚》结尾时沉痛地呼喊：

“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屈原为实现其“美政”理想奋斗终生。他为之生，也为之死。其一生全部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都是以实现其“美政”理想为最高和最终目标。最后，当他这一理想彻底破灭的时候，他便以身殉国了。因此，我们要想正确认识屈原和他创作的思想艺术价值，正确评价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首先必须对其“美政”理想的内容和意义有一个全面正确的理解。这里仅作一初步探讨。

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制度刚刚取代奴隶制度的历史大变革时代，是由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向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过渡的历史大转变时代。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矛盾复杂，斗争激烈，变革急剧的时代。屈原的“美政”理想，是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社会矛盾的产物。

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在历史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由于“奴隶革命把奴隶主消灭了，把奴隶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废除了。”（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由奴隶制生产关系变成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同时，也使奴隶变成了农奴，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获得了相对地提高，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这件事有很大意义。”（列宁：《论国家》）

但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以一种新的剥削形式代替一种旧的剥削形式，它的革命是相当不彻底的，进行也是相当缓慢而曲折的。

在我国奴隶主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度的瓦解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土地占有制度。《国语》中所谓“大夫食邑，士食田”就反映了这种情况。“食邑”制度，是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度。封君不但占有土地，而且还占有领户。所谓“高爵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②”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它保留着深厚的奴隶制残余。这说明，在封建制开始的时候，它同奴隶制保持着相当深厚的联系。另外“食田”制度，是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度。封建地主对农民虽也有人身强制和超经济剥削的关系。但是，它同“食邑”制是有区别的，这里的农民不是地主的领户，封建地主和农民虽然有等级区别，可

是，他们都是封建国家的“编户之民”。这种土地占有制度是在奴隶主土地国有制解体后出现的较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它在当时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封建主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不断分封宗室、功臣，因而使各诸侯国的食邑制得到不断发展，代表领主的“巨室”集团的势力不断扩大，他们的政治代表逐渐控制了各诸侯国的政权。利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对广大农奴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封建贵族奢侈腐化，大肆挥霍，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他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广大农奴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③。”封建主阶级和农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成千上万农奴逃亡，农奴起义不断爆发，由小到大。至战国中期，这种农奴反抗斗争规模越来越大。农奴解放的历史潮流风起云涌，农奴起义的烈火燃遍南北各地。当时“盗跖”“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④。”他的足迹遍及大河上下，他转战南北各地。跖的遗迹从西秦至东齐不绝^⑤。南方的庄蹻，不但把楚国的封建贵族的统治打得“分而为三四”，而且攻入国都“郢”，《吕氏春秋》说“庄蹻暴郢”，并且把这次农奴起义同战国时期的最大一次战役“长平之役”相提并论，可见它规模之大。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9页）。由于农奴起义席卷各地，封建主阶级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孟轲所谓“贼民兴，丧无日矣”，反映了封建贵族政权的危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山林资源的开发，特别是铁的大量开采，铁器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这就使保存浓厚奴隶制残余的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度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封建割据的政治制度很快就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于是广大农奴奋起斗争，砸碎枷锁，

推动社会继续前进。“阶级斗争，人民中的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列宁全集》第8卷176页）新兴地主阶级，适应农奴解放的历史潮流，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主张改革政治经济制度，推行法治，反对礼治，剥夺封建贵族特权，推进地主阶级革新事业。于是，变法运动便应运而生。

战国初期，魏文侯时李悝倡导法治，图谋“富国强兵”，取得很大成效，魏国成为当时第一大强国。楚悼王时吴起变法，从此楚国“南平百粤，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⑥。”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前355年）实行法治，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当时，赵、齐等也都先后实行改革。尤其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改革最大，效果最显著。秦国成为战国中期以后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这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各诸侯国政治改革运动的普遍进行，由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向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转变的条件日趋成熟。各诸侯国地主阶级集团，为满足各自的阶级利益，互相进行着政治的、军事的激烈的斗争。于是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也空前尖锐起来。

屈原是一个贵族后代，他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转变了立场，成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我们这个认识是从考察他的政治实践之后得出的。怎样认识屈原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想，在屈原研究中是存在分歧的。一种意见是，根据他出身贵族，便否定其政治立场和政治理想的进步意义。这种意见认为，屈原的政治思想“好些在当时都已经是过时了的”，“我们应该加倍注意的，不是他的那套政治理想，而是他的实际的政治态度和斗争^⑦。”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屈原虽出身于贵族，但是到了屈原生活的时代，在楚国三大贵族中，昭、景掌握着楚国主要军政大权，屈氏势力不如昭、景。屈原在《九章·惜诵》中自言“贱贫”。据《韩

非子·喻老》篇记载：“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屈原所谓的“贱”，可能是指失去了“世袭”地位；所谓的“贫”，可能是指失去了“世禄”特权。故而，在激烈的现实斗争中，他有可能转到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来，同封建贵族展开不调和的斗争。持否定屈原政治立场，政治理想进步意义意见的同志，他们没有看到在尖锐阶级斗争和复杂社会矛盾影响下，屈原政治立场所发生的变化，同时，他们把政治立场、政治理想同政治态度和斗争精神分割开来，对立起来，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其实，当时一些有见识的贵族，在现实矛盾斗争中，看到了贵族统治的没落、腐朽，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人民的力量，历史的趋势。因此，认识到只有改革旧的经济、政治制度，改革旧的剥削方式，才能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其阶级的统治。他们主张改革，奋起同贵族斗争，于是，他们就成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成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当时，这种人物是不少的。例如，商鞅，原是卫国没落贵族，到秦国辅佐秦孝公变法，成为法家政治家典型代表。再如，韩非，是韩国公子，却成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思想和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定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未来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屈原就是在历史大变革中，政治立场发生转变的一个人物。

关于屈原的政治立场另一种影响很大的看法是，认为“屈原尽管与楚王同宗，事实只等于楚国的一个平民^⑥。”这种观点，也是值得研究的。用它来说明屈原的阶级立场，容易引起思想混乱。按照史学界一般看法，我国在战国时期，已经进入了封建社

会，到屈原生活时期，封建制度已经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尽管在对立阶级中，还有阶层差别。但是，不管封建贵族也好，新兴地主也好，他们都是当时的主要剥削和压迫阶级，只不过他们各自历史作用不同罢了。“平民”似乎不应该是地主阶级的同义词。“平民”似乎应该属于被统治阶级。如果说屈原是属于被统治阶级，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平民”说，完全是由于对屈原的偏爱而引出的结论。正是在这种观点指导下，把屈原完全看成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这是不正确的。

屈原开始做“左徒”（仅次于令尹）的时候，楚国正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历史关头。在国内，贵族统治十分腐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战国策》载：“楚国多盗”，“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庄跻大起义，使楚国贵族统治面临危机。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剥削和压迫愈重，反抗和斗争就愈烈，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庄跻起义就是楚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激烈的集中、突出的表现。屈原“明于治乱”，面对现实，他清醒地看到了贵族统治已经丧失希望，在楚国唯一的出路，就是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改革。

这时，大一统趋势日益成熟，各诸侯国地主阶级集团都企图由自己去实现统一。那么，究竟由哪一个国家来统一，这需要各方面的主客观条件。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却在于能否实行彻底改革，从而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大国家。这时，“七雄”中有三个强国，就是西方的秦，东方的齐，南方的楚。秦国最强，它直接威胁着楚国的生存。当时，楚国也还有许多有利条件。“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幅员最大，兵力最多，武器也最精锐。荀子《议兵》篇说：“宛鉅铁钲，惨如蠡蛭。”还有所谓“强楚劲韩”的说法。秦昭王说：“楚剑利，故其卒

强”。同时，楚国资源丰富。楚国不但使用铁器早，而且产量也多。铁，不论发展农业和进行兼并战争都是最重要的物资。刘向的“横则秦帝，纵则楚王”^⑥的说法，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秦楚争雄的客观形势。这说明当时楚国还有条件同秦国争胜负。但是，楚国政治上落后于秦国，远不如秦国改革彻底。楚国地主阶级不甘心其国家的落后局面，为摆脱内外困境，企图实行“立法富国”的革新路线，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壮大国家力量，不但同秦国争雄，并建立统一帝业，因此，便产生了屈原的革新的理想和行动。

屈原的“美政”理想是地主阶级革新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以君圣臣贤为原则的，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对内改革内政，修明法度，选贤举能，重视民生疾苦；对外联齐抗秦，结交强援。壮大实力。通过内政外交措施，富国强兵，成就统一帝业。他的归宿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王国。当时楚怀王曾经一度想图强称霸，大约屈原任“左徒”时楚怀王正担任六国纵约长。于是，便对具有远大政治理想，主张改革，又富有内政外交才干的屈原委以重任。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⑦。”他在内政外交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联合了同一派人物和自己培养起来的人才，开始进行政治改革。首先是草拟新的法治条令。这就是《史记》本传中所谓的“造为宪令”。这是屈原亲自起草的，其中包括屈原政治改革的具体措施。这是屈原法治革新思想和行动集中、突出的表现。可惜这个重大问题，却被许多论者忽视了，甚至有人强烈反对屈原是“法治革新者”，认为这样说“是没有根据的。”这完全是不看事实说话。我认为，说屈原是法治革新者，不但有根据，而且证据十分确凿。上面提到的司马迁讲屈原“造为宪令”便是。“宪令”一词是先秦法家和人们评论先秦法家常用概念。《韩

非子·定法》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又在《和氏》篇说：（卫鞅）“燔诗书而明法令”。司马迁记载法家言行时说，吴起“明法审令”，秦始皇“明法度，定律令”。够了，不必再多举了。而且，最重要的根据是屈原自己在《惜往日》中回忆他们君臣开始实行法治改革时说得分明明白。他说“明法度”，“国富强而法立”，这同法家代表商鞅的“明法令”、“法任而国治”所使用的语言和所表达的内容是相似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屈原同商鞅等同起来，也不是认为屈原整个思想体系完全属于法家，可是，屈原的政治思想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成分却是不容否认的（详见第二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战国中期以后，法治和礼治是两条对立的治国方针。屈原正是从法治立场出发，反对贵族的“心治”（即礼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乘骐骥以驰骋兮，无辔衔以自载。

乘汜淪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

指出“心治”就象骑马不备辔衔，乘舟不具桨棹一样，将有颠覆灭顶之危机，这里是通过比喻说明治国根本之道。这里崇尚法治，反对礼治（心治）的思想表达得何等鲜明！《韩非子·用人》篇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在治国必须实行法治这一点上，屈原和韩非的观点有其相似的一面。

屈原从坚持法治立场出发，对楚国贵族集团违法败纪行为作了猛烈的抨击：

固世俗之工巧兮，偃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

这里屈原倡导循“绳墨”“规矩”，同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追曲”“据法直言，循绳墨，诛奸人”的坚持法治原则的精神是相通的。

有《史记》屈原本传清楚记载，有《惜往日》明白确切地表达，又有《离骚》为根据，屈原有主张实行法治的一面，倡导改革内政是可以肯定的，推翻不了的。

联齐抗秦，是屈原治国方针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屈原实行法治，修明内政的措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楚国立场出发，面对强秦的威胁，只要同齐国联合起来，就构成在三个强国中二对一的优势，从而取得稳定的国外环境，便可为改革内政创造条件，赢得时间。对楚国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外交政策。屈原是坚持这条外交路线的核心人物。

秦国统治集团，十分害怕齐楚联盟，千方百计破坏。秦国派张仪先后到楚国活动。他或以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为诱耳，诱使楚怀王上钩，瓦解齐楚“纵亲”，以便各个击破；或利用楚国内部新旧势力的矛盾，挑拨离间，最后达到破坏屈原所代表的联齐抗秦维护国家独立的外交路线的目的。《新序·节士》篇载：

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贵臣上官大夫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于外……

靳尚、子兰、郑袖等楚国反动贵族，十分仇视屈原的内政外交方针。在楚国改革政治，修明法度，必然要限制贵族特权，甚至对

他们是一种剥夺，当然要引起他们强烈的仇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司马迁不可能正确认识屈原同“党人”斗争的性质，他认为只是由于“党人”“争宠而心害其能”。而把“造为宪令”与“夺稿”只看作是“争宠”的一种表现，这样就把问题性质混淆了。封建社会学者一般都承继司马迁的观点，有的甚至连“造为宪令”这一事实也抛弃了。他们把屈原同“党人”的斗争只看作是“争宠”，只看作是一般的正与邪、忠与奸的斗争，这就掩盖了屈原党同党人矛盾斗争的政治内容，也就不能正确说明屈原同“党人”斗争的性质。应该指出，古人这样认识是不奇怪的，我们是不能苛求的。但是，今天许多论者仍然停留在司马迁的认识水平上，不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屈原同“党人”的矛盾斗争性质，则是不应该的。其实，“党人”对屈原的陷害，除“争宠”这一剥削阶级争权夺利因素之外，其背后隐藏着一个重大的政治因素。这就是“造为宪令”。“党人”同屈原“争宠”，是争着各自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造为宪令”就成了矛盾的关键。因为屈原所造的“宪令”从根本上危害了反动贵族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才阴谋活动，在楚怀王面前进谗，用造谣中伤的卑鄙手段陷害屈原，最后达到破坏屈原内政外交路线的目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屈原同党人的斗争是战国中期历史性的社会大变革中引起的矛盾斗争在楚国上层社会的反映，它是楚国新旧力量在政治斗争上的表现，这就是屈原同“党人”的矛盾性质。

屈原为满足其政治路线的要求，他倡导“举贤而授能”，反对贵族“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和屈原同时代，稍早些时候的孟轲，为了维护封建贵族的统治，他坚持以“亲亲”为核心的“世卿”、“世禄”制度。他维护宗族血缘关系。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又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⑩”换句话说，就是按照“巨室”的意志行事。“巨室”是什么？赵歧法云：“巨室，大家也，谓

卿大夫之家”。也就是享有世袭特权的封建贵族。屈原在政治实践上，则同“巨室”针锋相对，他大声疾呼，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离骚》中说：

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联系屈原全部思想来看，他们说的“循绳墨”是维护“法治”的同义语。这里他把维护“法治”和“举贤授能”联系起来，是用以反对“任人唯亲”的封建贵族用人路线，它反映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益。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这一意思在《惜往日》中也再次出现。他热烈赞扬从社会下层发现选拔人才，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他的斗争锋芒是直指楚国反动贵族集团的统治。这和韩非赞扬从“岩穴”、“圉圉”、“烹割”、“饭牛”^⑫中选拔贤能，所用的历史故事和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是一致的，是企图使国家政权从世袭贵族手里转到新兴地主阶级手里，实现地主阶级专政。

二

关于屈原思想所属学派，历来大都认为是儒家。淮南刘安（见班固《离骚序》）、王逸（《离骚》序）、朱熹（《楚辞集注》）、